·历史研究·

“新知”与“革命”言说的世纪井喷

——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论考

潘世圣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近代留日学生杂志是近代中国人留日史以及近代报刊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近代中国人留日始于1896年,20世纪之后进入繁盛时期,留日学生杂志的兴起发展与留日热潮相对应,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达到鼎盛状态,留日学生杂志多达近百种,形成海外留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些杂志具有鲜明的同一特征:关切国家民族危机的国族意识,放眼世界追求新知的开放性,追求变革革命的前趋性。从“留日”“学生”“杂志”的视角出发,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可以把握描述其整体结构和多元意义,还原一群中国留学生在明治日本末期通过杂志呈现的独特景观。

[关键词]留日运动;留日学生杂志;国族意识;维新与革命;杂志转型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5-0064-07

一、近代留日运动与留日学生杂志的派生结构

20世纪初头的留日学生杂志现象,是留日运动的衍生品;而留日运动又是19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救亡保种”“救国图存”之时代潮流的直接反应;从思想文化史角度来说,它是一个通过留学追求变革·革命以保国保种的政治性思想性运动①。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引信。战争的败北除了导致大清帝国给日本割地赔款之外,更引发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于是“保国救亡”成为举国上下最紧要的民族性课题;于是,刚刚打败中国的日本——其快速的强大崛起进入中国朝野上下的视野,而一部分开明的晚晴朝廷重臣以及洋务派改革派的呼吁和推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之洞(1837-1909)《劝学篇》(1898=光绪24年,两湖书院刊印)提出日本维新成功的经验便是派遣青年留学西洋,“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更列举了留学日本的种种好处:“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斟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②另一位晚清重臣——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中国留日学生杂志综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另,2012级硕士研究生张月同学在资料收集和考察方面有所贡献。

[作者简介]潘世圣,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日本九州大学博士。

①此方面的研究考察数量颇丰,可参阅(日本)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修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上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等。

②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16、1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督、清末新政的推进者刘坤一(1830－1902)也与张之洞同声唱和,认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唯有赴外国游学一法。”①1901 年,清王朝实施以维新变法为目的的“庚子新政”,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三次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而“奖励游学”便是他们提出的重要举措之一。这样,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便成为清政府的国策②。

向前回溯,1896 年,即中日缔结《马关条约》的第二年,13 名中国青年奔赴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学习,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此后,留日学生逐渐增加,1902 年嘉纳治五郎访华,专门到湖南与张之洞会面,推动赴日留学,倡议大力推进师范教育;1903 年中国政府向全国转发张之洞拟定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③,规定了若干奖励赴日留学的措施;再加上日本方面、如当时的驻华公使矢野文雄(1851－1931)积极推动清政府长期派遣留日学生,并在日本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1900 年,日本政府发布《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委托生规程》,1901 年发布文部省令第 15 号《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规定由日本外务省、日本驻外公馆或外国驻日公馆介绍,外国留学生可进入文部省直辖学校留学,从而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正式开启了中国人赴日本官办学校正规留学的途径。自此以后,国人留日热潮大幅升温,到 1906、07 年左右形成了第一个留日高潮,留学生人数的推移也急速变化:1896 年 13 人、1898 年 61 人、1901 年 274 人、1902 年 608 人、1903 年 1300 人、1904 年 2400 人、1905 年 8000 人、1906 年 12000 人、1907 年 10000 人、1909 年 3000 人、1912 年 1400 人④。顺便一提,鲁迅 1902 年赴日留学,1909 年回国,恰好完整经历了清末留日运动由正式开启到极盛而衰的完整过程。

就这样,肇始于 1896 年的留日运动与甲午战争(1895)—戊戌变法(1898)—清末新政(1901)互为表里,尤其是清末新政,积极推进留日运动的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被朝廷委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在这样一种政治格局中,汇集在“变法”和“革命”的潮流方向之下,留日学生杂志纷纷诞生。1900 年 12 月,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创刊,其体例完全仿照日本杂志,编辑形式、版式设计、印刷装帧等也都取法日本,基本具备了现代杂志的所有要素,成为近代中国杂志出版史上的重要一章。

以此为开端,留日学生们纷纷建立各种各样的社团,出版发行各色中文期刊,一时间学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关于 1900 年代这一时段的留日学生杂志的数量,各种资料文献均有记载。如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留学史》(三联书店,198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以及宋原放《出版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等,均是考察这一问题时不可忽略的参考文献。笔者自早年留日时即对这一段历史殊感兴趣,一直予以关注,在进行系统详尽的考察研究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搜寻到这些杂志的原物。由于:第一,杂志时代久远,均在百年之前;第二,杂志编辑出版于日本,尽管杂志以不同方式流回国内,通过各种途径在国内书店代理销售,但终究有很大局限;第三个因素最重要,杂志均为留日学生创办的中文学生同人刊物,与一般性刊物不同,尤其是在日

①《光绪谕折汇存》卷 21。另,鲁迅 1902 年在刘坤一任上赴日留学,并得“南洋通商大臣奖学金”资助。

②参见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上册),第 41 页。

③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版,第 186 页。

④有关诸种统计数据略有不同,本文参照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 185－186 页。

本,无法与其他刊物一样进入通常的流通订阅保存利用体系①;第四,杂志存在时间往往十分短暂,一年以内即停刊的不在少数,处于随生随灭的状态,或者存在时间本身很短,中途又发生刊名变更等。这些原因使得不少杂志今天很难寻觅到原刊,更难看到保存完整的原刊。截止目前为止,笔者已确认原刊(含复刻复制版)形貌的有30余种,而其他的则通过各种资料文献进行调查,初步判断1900年代的留日学生杂志的数量当在70-80种左右,这也是目前的多数意见。罗列其中比较重要者如下:《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第四号后改称《汉声》)《直说》《浙江潮》《江苏》《湖南学生》《女子魂》《海外从学录》《东京留学界纪实》《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革命评论》《直言》《云南》《洞庭波》(中央杂志)《教育》《豫报》《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汉帜》《汉风》《中国新女界杂志》《河南》《四川》《江西》《关陇》《夏声》《湘路警钟》(湘路危言)《宪政新志》《教育今语杂志》《铁路界》等。

二、"译介"新思想与开启民智的基本方略

留日运动的基本思路既已是开眼看世界,谋维新变法改良革命以救国图存保国保种,而具体途径便是学习东亚日本这一成功的先例。既学习日本,更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具体说便是经由日本人选择译介源自西洋的新的思想·社会·文化理论学说。正如张之洞所述:"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斟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当时这种认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1898)、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1899)都极力推崇日本近代以来的西书翻译在国家社会转型过程的巨大作用,倡议中国大力翻译日本新书。在这样一种思路和风潮的导引下,留日学生杂志的第一个目标和着眼点,就是翻译·"译书"。1900年底创刊的第一本留日学生杂志为《译书汇编》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出身日本华侨家庭、参与创办早期留学生杂志的冯自由(1882-1958)在其名著《革命逸史》中称《译书汇编》为"留学生杂志之元祖"。该杂志由留学生戢翼翚、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章宗祥、曹汝霖等人组织的译书汇编社编辑出版。创刊号的刊物《简要章程》明确说明了杂志的出版宗旨:"以政治一门为主,如政治经济法律行政历史政理各门,每期所出或四类或五类","政治诸书乃东西各邦强国之本原故,本编亟先刊行此类,至兵农工商各专门之书亦有译出者,以后当陆续择要刊行"。杂志编译者们自身多学习法学专业,认为国家要改革"宜取法欧美日本之制度",而"各国之制度,非可徒求诸形迹,要当进探乎'学理',否则仅知其当然,仍不知其所以然。"故刊物以译介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学说为主,尤其聚焦宪政理论,亦涉及法律、经济、外交、历史、哲学等领域。创刊号的十篇译文均为欧美和日本的名著:(美国)伯盖司《政治学》、(德国)伯伦知理《国法泛论》、(日本)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德国)海尔司烈《社会行政法论》、(法国)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日本)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近时外交史》、(日本)酒井雄三郎《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法国)卢骚《民约论》和(德国)伊耶陵《权力竞争论》。这些翻译均是名副其实的"译书",即所译为书,或连载或节译,之后出版单行本。杂志创刊第一年便出版了涩江保著、译书汇编社同人译《波兰衰亡战史》,高田早苗著、嵇镜译《国家学原理》,岩崎昌/中村孝著、章宗祥译《国法学》,井上毅著、章宗祥译《各国国民公私权考》。总体上,对建构西方式政治体制关联的诸种理论学说的关注,是该刊也是整个留学生杂志的重要主题。诚如研究者所评价的那样:"译书汇编社成立早,译书多,对国内也有相当影响,其所译

①笔者对日本国家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有关留日学生杂志的收藏情况进行了调查确认:该图书馆收藏的留日学生杂志仅有《云南》《汉帜》《湖北学生界》《新世纪》《浙江潮》《天义》《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游学译编》等九种。除不算完全的学生杂志的《民报》藏有原刊外,其余均为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民国五十七至六十八年(1968-69))所收之影印版。

政法书籍被近代学术界认为是最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著作”①。

另一本同类杂志《游学译编》月刊(1902.12－1903.11),编译者为湖南籍留学生组成的“湖南编译社”,成员有杨笃生、陈天华、梁焕彝和黄兴等人。与《译书汇编》主要翻译学理性学术著作不同,《游学译编》主要以日本报刊为对象,择取所需,编译成书。该刊第一期《游学译编叙》中开宗明义,称“欧洲自十八世纪以来,思想横溢,沛然如骤雨之下”,“各携其专精独到之理论,以争雄于学界,因而弥及于社会,行之于实事,使之有日进千里之势,已成今日之文化。”“维新三十年来之日本,又何日而不视欧美之进步以为进步,奋起直追,唯恐不及,以成此过渡时代之现象,而不知其所止也乎？由此观之,则我中国者,以东洋文明之固有,而得老大之名,以西洋文明之将来,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夫岂有难耶？同人之译是编也,将以为扶植老大培植幼稚之助也”。很显然,编译者从近代欧美的思想文化和日本以西洋为典范的文明开化那里看到了新的历史趋向,意欲通过自己的努力,既守护传统精神,又迎接新世纪的思想文化,实现自我更新,显示了这一群留学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杂志的编译内容与稍早的《译书汇编》专注政治学不同,涉猎了学术、教育、军事、实业、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时论、新闻、小说等诸多领域,近乎无所不包。第一期的内容如实反映了刊物的这一特点:(学术)《十九世纪学术史》、(教育)《教育论》《华族女学校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军事)《武备教育》、(理财)《经济政策论》、(内政)《新定统治蒙古制度》、(外交)《欧洲近时之外交》、(历史)《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述》、(地理)《支那地理概述》、(时论)《太平洋之竞争》《德人论在支那生计上之利害》《上野岩太郎与吴挚甫京卿论教育事》《世界新闻》。在此两种杂志以外,还有一批专事译介的刊物和结社,如《新译界》、教科书译辑社、闽学会、国学社、东新译社、觉民译社等等。

放眼欧日编译新书,不限于这些编译刊物和社团,同时也是其他综合性留学生杂志的重要板块。以当时影响较大的杂志来看,《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等,几乎每一个刊物都有不少翻译。有些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显示是翻译或编译,但实际上明显具有译介性质。

三、“变法”“革命”与救亡图存的政治指向

留日学生杂志,无论是专事翻译新书的编(翻)译杂志,还是普通的综合杂志,其根本指向和目标都是共同的,即认识世界趋势,奋起变革社会和政治体制,实现国家民族的自立自强,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游学译编》第七期《与同志书》如此疾呼:“今日国势,危险极矣,仁人志士,奔走骇汗,大声疾呼,曰谋救亡之法,愤于国力之弱矣,则曰讲求武备;痛民生之窘苦也,则曰讲求实业。政体不变,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也,则讲求政治、讲求法律。民智不开,民气不伸,而政治法律卒莫能变也,则曰讲求学问,讲求教育。”数量更多,影响巨大的非编译类杂志,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云南》《洞庭湖》《革命评论》《四川》《河南》,多达几十种。与编译类杂志相比,这些杂志内容板块丰富多样,无所不包。编译类杂志以传递“他人”声音为本,而综合杂志则没有“翻译”的限定。留学生们把握世界现状和时代动向,发表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见解,探讨变革进步的方法方案,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火热局面。

浙江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辑的《浙江潮》(1903.2)创刊较早,其《发刊词》记述浙江籍留日学生“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侧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回《浙江潮 》。”执笔人用充满激情的诗意语言,回溯浙江历史文化积淀的爱国传统,所谓“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以“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口其雄心,以养其气魄。”“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

①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上册),第 72 页。

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杂志宗旨一曰“输入文明为我国放一层光彩”;二曰“本志立言,务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三曰以浙江“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为立足基点。在中国留日学生江苏同乡会主办的《江苏》(1903.4)第一期,社论《江苏改革之方针》表达了对国族存亡危机的极度忧虑:“夫国之有改革,因乎时之变也,故欲行改革者,莫急乎明时势之所变。今我中国之所以异乎昔者,其至要之大端则昔为大一统垂裳无为之大帝国,今则已成列国竞争之一分子。天演学之公例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今国势以趋于列邦,而吾政治吾教育吾风俗尚仍大一统之旧,其为不适甚矣。此所以屡改革而不救”。1906 年创刊的《河南》月刊同样努力于“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为宗旨”,“中国者非政府诸人之所专有,国民各个人俱其分子之一,政府特其执行者耳,政府之建设,非由于政府,实由于国民,政府之不良,国民应有改造之责”①,试图致力于启发民智,通过民众制约改造政府,最终为拯救国家民族危亡尽职尽责。《湖北学生界》(1903)《湖北学生界开办章程》“第一条 宗旨/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杂志第一期张继煦所作《叙论》写道:“自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亚洲以外之天地,一草一石,无不有主人翁矣,鹰瞵虎视者数强国,四顾皇皇,无所用其武。于是风飚电激席卷而东,集矢于太平洋,亚洲识微之士,莫不深瞩蹙额,惊走相告曰:危哉! 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由此可见,20 世纪初头,弥漫于国人之间的国家民族存亡危机的阴云,其浓密沉重乃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五年间,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课题,即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改革”是解决这个课题的唯一途径,而“立宪维新”与“革命”则是当时最主要的两种“改革”路径。对于“清末新政”所代表的立宪维新和“辛亥革命”所代表的革命,历史学界已有足够多的研究。这是一个具有多个侧面的巨大课题。“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改革的方式方法和道路上存在重大差异,但与时代潮流相向而行,拯救国家社会于危机,实现自由民主富强文明,则是一切真正的仁人志士的初衷和动力,也是许多人用鲜血和生命代价践行的理想。对这样的仁人志士,人们始终抱有由衷的理解和感念。具体到留日学生杂志而论,简单明了痛快的“革命”论无疑更具有魅力,更能够唤起年轻留学生们否定抹煞腐朽体制、追求世界大势的激情梦想。

在 1900 年代的留日学生杂志中,大部分是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杂志,绝大多数都赞成“革命”论。当然,其“革命”论与变法维新派在输入东西方文明学术,开启民智;呼吁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提倡地方自治,鼓励发展实业等方面存在重叠部分。而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彻底批判否定清王朝体制上,则存在重要差异。这些特点大面积存在于留日学生杂志中。出版发行时间长达数年的《云南》(1906.11)创刊号《发刊词》宣称:“非仅商榷学术,启发智实之作,实为同人爱乡血泪之代表;非激越过情之谈,实不偏不颇,具有正当不易之宗旨;非草率无责任之文,实苦心孤诣,抱有绝大希望者也。”希图通过刊物“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并宣传“国家”“团结”“公益”“进取”“冒险”“尚武”“实业”“地方自治”“男女平等”等近代文明观念。在各期的文章中,除了对云南地方封建性腐败吏政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乃至掠夺的忧患之外,还彻底否定了清末新政中的重大议题“预备立宪”。新政始于 1901 年,1904 年,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击败世界传统强国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君主立宪由此成为全国朝野内外的共识。清政府忧虑孙中山“同盟会”革命派的壮大,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派五大臣赴西方考察,从而开启了立宪与革命的博弈。在这两条线路中,《云南》明确选择了抛弃清王朝政府的君主立宪这一选项:“今日之提倡立宪,要求国会者,皆欲利用国民者也,非代表国民者也。日日言爱国救国,而实则谄媚政府,依赖政府,则以开国会为利用国民之策也。”立宪的结果也绝不是美好的现实,“中央则君主暨贵族专制之政治也,地方则官吏与劣绅土豪之政治。”②还有文章提出,“涤尽数千年之

①朱宣:《发刊之旨趣》,《河南》,第 1 期。

②侠少:《国会问题之真相》,《云南》,第 17 号第 38 页。

弊政,以恢复人类之天赋特权”①——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共和民主,才是革命和进步的恰当选择②。仅发行三期的《四川》(1908)激烈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辨析外国列强蚕食控制中国方式的变化,指出,列强染指中国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将“瓜分之议倏易为保全侵略之行,忽变为礼让”,恰如“一盂杯羹,或因分与之不平而起竞争。于凡席者,矫以保全为侵略较以侵略为侵略者,其势尤利而术尤工 盖自庚子以至于今六、七年之间,皆为彼阳示保全阴谋侵略之时代。”③他们“先取经济后分土地,而以吾政府为镇压之资,即彼经济无丝毫之损”,实乃“亡中国先亡实,后亡名耳。”④文章作者关注到列强在中国的作为与清王朝腐朽政权体制的关联,从而进入了由反帝爱国继而反清革命的因果逻辑关系中,有文章激烈批判道:“比年以来,政府卖铁路,卖矿产,卖航路,卖海港以及森林、渔业、关税诸权。他国所视为重要而倚如性命者,政府则慷人之慨,咸三揖三让拱手而献诸外人,叱咤之间,风云变色,不及数稔,吾完全之土地权将一一为卖国之政府掉尽而不留孑遗”⑤。因此作者呼吁人民,“政府而可改良也,则群起以监督政府”,反之“则群起以攻伐政府”⑥。

留日学生杂志倾向和选择“革命”,放弃清王朝的政权体制,具有很大的逻辑必然性。救亡图存的危机感和使命感,驱使留学生们以向内向外两个视点观察和思考问题。对外自立图强以抵御外辱,对内则由国家衰败追索到体制和政权的缺陷与机能停止,进而以最彻底的方式结束机能不全的恶劣状态。留日学生杂志与辛亥革命具有种种联系,不仅在思想文化层面,也在社会政治实践层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孙中山先生曾说:“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 从此渐作。”⑦

四、在近代中国杂志样式转型中的贡献

在近代中国杂志进化史上,尤其在杂志样式的现代化历程中,开创时期的留日学生杂志做出了重要贡献。

阅读这些杂志,人们会注意到,这些刊物与人们熟悉的杂志样式颇有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便是杂志的“综合性”特征。也就是说杂志具有百科全书的性格,囊括了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譬如,专事编译的《游学译编》就有如下栏目:“学术、教育、军事、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时论、世界新闻”;一般杂志如《浙江潮》:“影像、社论、论说、学术、政法、经济、哲理、教育、历史、大势、记事、杂录、小说、新浙江与旧浙江、苑、调查会稿”;《二十世纪之支那》也基本相同:“图画、论说、学说、政法、历史、军事、理科、实业、丛录、文苑、杂俎、时事、时评、来稿”。上述杂志内容构成和板块分类,是留日学生杂志的标准形式。这种杂志有一个国人并不太熟悉的称呼——“综合杂志”。而留日学生杂志的范本,自然是当时明治时代末期日本兴起并流行的综合杂志,尤其是开创综合杂志之滥觞的《太阳》杂志(月刊)。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来说,1895 的甲午年,都是各自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的年头。乘着日本战胜大清帝国的昂扬气运,《太阳》杂志于 1895 年 1 月问世,三个月后,《马关条约》正式签订,中日关系发生彻底逆转。对日本报刊出版界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与中国不同,在日本,有一种

---

①剑虹:《论国民之责任》,《云南》,第 7 号第 18 页。

②参见木基元:《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云南〉杂志及其革命影响》,见田云翔主编:《百年军校 将帅摇篮》,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③《列强协约与中国之危机》,《四川》,第 3 号第 1 – 2 页。

④《警告全蜀》,《四川》,第 1 号第 10 – 11 页。

⑤⑥《西江警察权问题》,《四川》,第 2 号第 121 页,第 126 页。

⑦朱庭祺:《美国留学界》,《留美学生年报》,1911 – 07(庚戌第 1 期)。关于这一问题,魏善玲:《留日学生创办期刊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编辑之友》2012 年第 2 期)有几种介绍,可资参考。

名曰综合杂志的刊物,它的内容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评论、时事报道以及文艺作品,篇幅份量厚重,在报刊出版界占有重要地位。这类杂志在昭和(1925－1989)之前被称为"高级杂志",后来则改称"综合杂志"。今天,在日本仍有多种著名的综合杂志存在,如《文艺春秋》《中央公论》《新潮》等等。作为日本报刊的重要品目,吸引着大量读者。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今日的综合杂志商业色彩浓厚,有些甚至不免娱乐猎奇以及渲染和噱头。不过,最初的综合杂志并不是这样。它的鼻祖《太阳》月刊,就是一本以社会启蒙为目标之一、严肃厚重具有学术性的大型杂志。《太阳》杂志的东家是明治时代有名的出版社"博文馆"(1887 年—现在)。1895 年 1 月,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胜局已定,日本举国上下士气高扬的情形下,博文馆对其麾下的杂志进行整合,将原有的 15 种杂志合并为综合杂志《太阳》(1995—1928)、文艺杂志《文艺俱乐部》(1895—1933)和《少年世界》(1895—1834)三大杂志。《太阳》是以原《日本大家论集》《日本商业杂志》《日本农业杂志》《日本之法律》和《妇女杂志》这五本杂志为基础,整合而成的。内容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时事、思想、文化、文学、宗教、教育等各个领域;作者阵容庞大,聚集了当时最有名的评论家、学者、撰稿人以及其他各类名人;杂志篇幅达二百页之多,发行数量超过十万。《太阳》创刊后,很快成为杂志出版界的王者。留日学生杂志样式体裁的源流就在于此。

借助于近代日本这个成功实现了近代转型的空间,留日学生杂志自然完成了从思想文化到杂志出版形式和技术的过渡,在此意义上,与同时期中国国内的杂志相比,留日学生杂志在质和形的两个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在近代中国留日研究领域造诣高深的实藤惠秀指出:"1907 年在日本创刊的杂志共 21 种,较该年在中国创刊的杂志为多,出版的册数亦甚可观。不仅是在数量上占多数,内容方面亦远较国内杂志为优,具有很高的启导作用。"①而当时这些引领时代潮流传递先端信息的杂志,通过个人或团体、以及出版流通系统等种种途径回流国内,必然对国内的杂志编辑和出版发生影响。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通过留日学生杂志,日本正在兴起的综合杂志对中国产生了各种影响,并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杂志——《东方杂志》(1904－1948)的诞生。被后人称为"百科全景式期刊"的《东方杂志》1904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创刊号(光绪三十年正月)《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郑重布告读者:"一、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二、本杂志略仿日本《太阳报》杂志"开设众多栏目,"1 社说(选论来稿附)、2 谕旨、3 内务、4 军事、5 外交、6 教育、7 财政、8 实业、9 交通、10 商务、11 宗教、12 杂俎、13 小说、14 丛谈、15 新书月目"。从杂志整体和局部设计来看,全面参考借鉴了《太阳》杂志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杂志的封面格调也颇相近,《太阳》的太阳光芒四射令人联想到刊名以及"日出之国";《东方杂志》的封面上边是大清国国旗上的巨龙,下端也是旭日放射光芒。与《太阳》相同,杂志开篇为"卷头插图",选择了世界名人照片,而第一幅就是"日本国皇帝睦仁"(明治天皇)。总之,无论《东方杂志》与留日学生杂志的具体关联如何,这个时代的留学生们为创办杂志付出的努力,其影响远远辐射到他们的祖国,确是一个明了的事实。

留日学生杂志及书籍装帧设计和装订等技术性形式上大量取法日本,最大的特征就是使用洋纸两面印刷和样式装订,而不是中国国内的单面印刷对折装订。我们通过整理中日书刊版权页,确认大部分书刊的印刷装订等均完成于日本人经营的印刷所,其中一部分书刊甚至与当时日本主流出版社使用同一家印刷所;还有不少书刊登有日本公司的广告;至于书刊装订方式、结构、书刊名、字体等方面,通过比照留学生书刊和《哲学杂志》等八种日本主流出版物,可以看到留学生书刊基本采用了日本书刊的形式,其中最大的改变是由线装演变为西式装订。日本书刊——留学生书刊——国内书刊这一影响流变的路径中,留日学生的努力居功大焉②。

[责任编辑:周　南　jidazhounan@163.com]

①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修译,第 349 页。

②实藤惠秀有详细考察,极富参考价值。见《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 251－280 页。